

碟碟不休

塔可夫斯基不领萨特的情

■韩连庆

【塔可夫斯基曾对学生说，电影会告诉你们“身边的世界是多么美好，会告诉你们速度和机器所具有的诗意以及工业所具有的非人道和壮丽的宿命。经常去看看电影吧。”】

多年前看过一篇文章，比较了两部表现战争时期儿童成长电影，一部是“文革”时期拍摄的《闪闪的红星》，另一部是前苏联拍摄的电影。文章说，《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固然罪恶极大，但是让十几岁的潘冬子手刃仇家，终归是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文革”中红卫兵的行径不能不说是这种“仇恨教育”造成的恶果，而前苏联的那部电影却聚焦于战争对儿童心灵的摧残，水平高下自见分晓。当时看那篇文章时观影渠道还不通畅，没记住那部前苏联电影的片名，多年后看了塔可夫斯基执导的《伊万的童年》，我猜测这就是那篇文章中提及的电影。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政治对文化的掌控有所松动，苏联电影界不仅拍摄了像《雁南飞》《士兵之歌》这类悲情而富有诗意的战争电影，而且每年拍摄电影的数量也有所增加，使很多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有了拍片机会。

塔可夫斯基从1956年到1960年在俄罗斯电影学院学习，师从拍摄过著名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的导演米哈伊尔·罗姆。罗姆认为，电影是不可教的，所以他提倡让学生按

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拍片。塔可夫斯基在1960年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压路机与小提琴》，片长不到五十分钟，讲述了一名七岁的琴童与一名压路车司机的故事。小时候我对压路机一直感到很神奇，尤其是一前一后两个巨大无比的石头车轮。每次看到沂青路，总在旁边玩半天，回家时溅得满身是泥青，让父母数落半天。塔可夫斯基在这部短片中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童趣。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影坛盛行以“少年英雄”为主题的电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打算以新的风格拍摄一部这类电影，讲述一位少年在战区的人生历程。可电影拍摄了大半却不尽如人意，电影厂决定撤换导演。塔可夫斯基半路接手了这部电影，重起炉灶拍摄完成了《伊万的童年》。

塔可夫斯基的父亲是一位诗人，从小受父亲的浸染，他的电影也具有诗歌的意境和节奏。有评论者指出，《伊万的童年》开场的梦境段落基本上就是他父亲的一首诗歌的具象化。伊万的家人在二战中被德军杀害，他加入了苏联红军，在敌后为部队传递情报，最后被德军抓住处以极刑。电影表面上讲的是一位少年英雄的战斗故事，可影片的整体构架却以伊万的四个梦境为基础，把伊万塑造得既像圣徒又像魔鬼。用法国评论家安托万·德·贝克的话来说，伊万堪称“圣童”，见证了人类的痛苦。

《伊万的童年》在196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金狮奖。可当时意大利的左翼报纸却攻击塔可夫斯基是具有小资嫌疑的导演，电影中的梦

境是对西方艺术的刻意摹仿。这些言论惹恼了当时正在意大利的法国哲学家萨特，撰文为塔可夫斯基辩护，称《伊万的童年》是苏联版的《四百下》(由特吕弗执导的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作)，电影中的梦境并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经历过大屠杀的少年们的真实写照：“他们战斗，并在战斗中逃离这种恐惧。而一旦黑夜解除他们的警戒，一旦他们入睡，就又恢复了儿童的稚弱，这时，恐惧再次出现，而他又重拾起想要忘却的记忆。这就是伊万。”

可对萨特的辩护，塔可夫斯基并不领情。他认为萨特采取的完全是一种哲学的视角，“在我看来，他的辩护并不合理。我追求的是艺术辩护，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辩护”，因为当萨特用哲学观念来评价影片时，艺术和艺术家却被遗忘了。

萨特确实说过电影是“活的哲学的丰碑”，可他也说过电影是“文明的学校”，是“艺术”。他对电影不仅有独到的理解和分析，而且还参与了很多剧本和电影的创作。他曾对学生说，电影会告诉你们“身边的世界是多么美好，会告诉你们速度和机器所具有的诗意以及工业所具有的非人道和壮丽的宿命。经常去看看电影吧。”

电影一旦在导演手下完成，就成了“有生命的影像”，值得从各种角度来阐释和理解。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来说，看电影并不顾及导演的意向，因为电影是外在于导演的，只有“擦掉”电影的“在场”的意义，才能显示出电影的新的“痕迹”。

山水人文

奔流到海还复回

■吴胜明

【李白的两句诗，从水的循环来讲应该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还复回；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唐代大诗人李白《将进酒》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开头，整首诗大气磅礴，回肠荡气。他的另一首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到长江时，则用了“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难道黄河之水真的不复回，难道长江之水也是去不还吗？

在《楚辞·天问》中也提到“东流不溢，孰知其故”这个问题。长江大河东流不息，而东海从不满溢，原因何在呢？古人多以“归墟”说解释，认为水入大海，进入了海底裂缝，故此海不溢。唐代柳宗元，宋代朱熹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也未能解决。这是个中学地理问题。

千千万万条奔流不息的江河，除了内流河，它们的最后归宿都是大海。这么多的河水注入了大海，怎么灌不满呢？大海把这些水“藏”在哪儿去了？

原来，大海在接纳百川的同时，海水也在阳光的照射下，无时无刻不在蒸发，形成的水汽上升到空中，随着大气的流动，有一部分进入陆地上空，在一定的气象条件下，又凝结成水滴或冰晶，又以雨雪的形式落到地球的表面，形成溪流，汇入江湖，又返回到海洋。这种海洋和陆地之间的水的往复运动过程，称为水的大循环。此外，还有在海洋上空凝结的水汽，又以降水回到海洋，称海洋小循环；在陆地上空凝结的水汽，又以降水回到陆地，称陆地小循环。正是这种水的循环运动，使得大海的水永远不会灌满。

李白的两句诗，从水的循环来讲应该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还复回；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当然，这就不是李白的诗歌，更不是李白的意思了，李白是讲，我们一定要珍惜人生大好的时光，去建功立业。因为时间就像黄河和长江之水，一去不复回啊！

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最先得出正确答案的是明代中期的大文豪杨慎。杨慎号升庵，四川成都郫县人，作者去四川考察九寨沟时，曾专程到其故居景仰。在其著作《杨太史升庵全集》中，他写道：“余谓：水由气生，亦由气灭。今以气嘘物则得水，又以气吹水则干，由一滴可知其他也……众流各有穷处，至此即气化而升，不必至归墟也。”杨的著作1554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在福建刻印，其后于万历年间刊行于世，对中国的文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杨慎是位神童，并且是状元，文学相当了不起，只是由于违背嘉靖皇帝意旨，被贬云南。他贬赴云南，一路注意观察自然现象写成了地理专著《滇程纪》。该书记录了云南500年前就有自制冰激凌卖十分有趣的地理现象。他反对“淡所见而甘所闻，贵其耳而贱其目”；主张“见睫者不若身历，张口者不若目击”(亲眼实践的意思)。杨慎正是在这种重视实践的精神指导下，发现了水的海陆大循环，从而解决了“东流不溢”的“难题”啊！

中国科学的不少问题是由文人解决的，尤其是一些热爱大自然的文人。



国画：黄河九曲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图片来源：昵图网

我总是遇见苏东坡

■李少君

我总是遇见苏东坡
在杭州，在惠州，在眉州，在儋州
天涯旅途中，我们曾相互慰藉
这次，在黄州，赤壁之下，你我月夜泛舟高歌

“你们前世肯定是经常一起喝酒的兄弟伙”是的，我喜欢听这样的说法，你我很多相似皆酒量平平，但嗜酒，其实是嗜醉，伴狂这也许就是乱世最好的逃避之道，酒可破愁散怀

你还讲相对论，这也是心灵学的物理学自其变者观之，万物不过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你我这样的兄弟可以饮同一场酒你曾凭此躲过了迫害、抑郁或癫狂的可能

相遇终有一别，东坡兄，我们就此别过长江边，芦草地，浮云和浮云亦曾邂逅流水和流水亦曾亲密无间远方，甚至惟有更远，才是最终的方向

【无论什么东西，列文虎克都要用显微镜看一看，从牙菌斑、血液细胞到精子，不一而足。】

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巴黎和伦敦的激荡人心的故事。本文则要简介一个“双人记”。2015年3月，诺顿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女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Laura J. Snyder (萝拉·J·施耐德) 的新书，《Eye of the Beholder: Johannes Vermeer, Antoni van Leeuwenhoek, and the reinvention of seeing》(观察者之眼：弗美尔、列文虎克和观察的再发明)。这本书是荷兰17世纪两位伟大人物的联合传记(“双人记”)，一位是科学家列文虎克(1632年~1723年)，另一位是画家扬·弗美尔(1632年~1675年)。

列文虎克从1673年起就做光学实验，最早的实验是用自制显微镜观察微生物。1694年春天，他解剖了一只蜻蜓的眼睛，将其角膜贴在了一个透镜前面，结果发现，街上教堂的尖顶给放大了好几倍。于是他写信将观察结果报告给英国皇家学会。

无论什么东西，他都要用显微镜看一看，从牙菌斑、血液细胞到精子，不一而足。不过，他最感兴趣的是视觉本身。很巧，列文虎克在代尔夫特市市场广场住所的街对面就是画家弗美尔的

阅苑有书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很多母婴室却直接开在女洗手间里，这又让独自带女儿外出的爸爸情何以堪？】

记得很久以前，我们需要保留很多票据，比如某某押金的发票；假如没能保存好发票，等到退押金时就会十分麻烦，甚至无法退得押金。但有时某项服务的押金也许交付于数年前，时过境迁，假如不是特别有心之人，往往很难找到这些原始凭证。

现在的情况自然有所不同。近年来的一些经历，让我感到在这点上已方便了许多。有时没有原始票据，对方也能找到相关资料，方便地办妥一应事宜。

多年以前我曾在国家图书馆办过一张借阅证，由于长期不用，结果找不到了，明知道它就在家里，却不知藏于哪个角落。前两年由于

服务的“最后一千米”

■星河

工作关系需要该证，前往图书馆询问，结果得知可以免费补办，而原来卡里的100元押金则自动转至新卡。不过管理人员也提醒说：免费仅限一次。说实话一次已经足够，已让我感受到了某种悉心关怀——毕竟上次办证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这种服务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进步，首先应归功于电脑网络的普及，技术的进步大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也与整个社会的服务意识增强密切相关——有时制度的变革未必有多难，只是要看服务者是否有主动服务之心。

不过，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整个社会都处处方便他人的时代，也还是有一些微小的细节会被忽视。而有时正是这些细节的不足，让各种精心安排流于表面，沦为形式。

有一次我在一家私立医院参观，那里设施精良，服务到位，环境优雅，一切都给人一种“惠及

如归”的感觉。但我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当时我在洗手，一个小男孩跑到旁边的洗手池边，双手明明已放在水龙头下，却用眼睛求助般地看着我。我朝他那边看了一眼，顿时就明白了——小男孩的手可以伸到水龙头下，但他却够不着水龙头下的红外感应器。我伸手帮他挡住感应器，水龙头开始出水，而我却在心里为医院的这个小小疏忽感到遗憾。

无独有偶，我在另外一家私立医院遇到的一件小事，同样让我想起一个有关洗手间的小问题。那次我从洗手间出来，发现一个小男孩正待进入，而在他的身后，却是帮他高举着点滴药袋却一脸无奈的妈妈。我马上明白了，帮忙接过药袋，陪小男孩上完了厕所。这件事本与医院无关，但我却由此联想起了另一件事：现在很多大型商场都已设有母婴室，除了用于哺乳，也方便大一点的孩子如厕——毕竟妈妈带着儿子或者爸爸带着女儿，去哪个洗手间都不够方便。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很多母婴室却直接开在女洗手间里，这又让独自带女儿外出的爸爸情何以堪？与上述疏忽一样，这看似似小的疏漏，将本欲方便于人的服务变成了笑话。

在服务性行业里，有一个“最后一千米”的说法(Last kilometer，在有些国家也被称为“最后一英里”，Last Mile)。所谓“最后一千米”，最初确实来自交通或运输系统的真实距离，用以描述运送中“最后的距离难题”。然而很快，这一概念便不再限于交通或运输行业，而蔓延到各个领域，尤以服务性行业为甚。因为无论是产品销出后的售后服务，还是行业服务的终端营销，都属于“最后一千米”的范围。因而这一概念也被引申为“完成一件事情最后且最关键的步骤，而通常这一步骤却意义重大同时又充满困难”。上述两个微小疏忽，其实也等同于这个“最后一千米”的问题，说通俗一点，就是没能在全局性的良好服务中发现并堵住所有的缺陷死角。

很久以前在报纸上看过一则短文，作者介绍说一位朋友开了家餐馆，在试营业期间诚邀各位友人免费试吃，进而还诚邀各位友人带着他们各自友人免费试吃，条件只有一个：每吃一次，必须指出餐馆的一处不足。作者不以为意，认为即便真有什么不足，待真正的顾客提出后再改不迟。朋友答曰：我要让所有的不足，都消弭于正式开业之前。事实上这位餐饮人士的所作所为，正是预先发现并堵住所有的缺陷死角。

『天花』与曹雪芹的悲剧

■隋淑光

著的《种痘新书》中记载到：“余祖承夏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种痘者八千九百人，其莫救者二十耳。”其治疗效果可见一斑。

随着种痘术的推广，其影响开始向国外辐射。在康熙年间，俄罗斯首先派遣留学生到我国学习痘症。此后种痘法后经俄国传至土耳其和北欧，后又传至欧洲各国和印度，渐及日本和朝鲜。至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术已遍及欧亚各国。【随着种痘术的推广，其影响开始向国外辐射。在康熙年间，俄罗斯首先派遣留学生到我国学习痘症。此后种痘法后经俄国传至土耳其和北欧，后又传至欧洲各国和印度，渐及日本和朝鲜。至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术已遍及欧亚各国。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伏尔泰(公元1694-1778年)曾就推广种痘技术一事批评法国人，他说到：“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中国人的种痘方法的确是大大不相同的；他们并不割破皮肤；他们从鼻孔把痘苗吸进去，就好像闻鼻烟一样；这种方法比较好受，但是结果一样。这一点可以证实：倘若我们在法国曾经实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公元1796年，英国人贞纳受人痘接种法的启示，试种牛痘成功。人痘接种术被逐步取代，渐渐淡出。人痘接种术无疑是我国人民最伟大的历史创造之一，它曾经挽救了无数生命，对世界医学科学的发展，乃至人类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价值毫不逊色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有学者推断，从小说中的情节看，凤姐女儿当是事先接种过人痘疫苗的，所以“痘虽发，却顺，倒还不妨”，此后果然内毒迅速散发，顺利康复。但现实生活中的曹雪芹却未如此幸运，因为当时对种痘的推广规模毕竟有限，除了官宦子弟及富家儿童外，贫寒庶民之家未必能普遍得益。有学者据不完全统计考证，曹雪芹的前妻育有一子，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癸未年)为虚龄十二岁，正是天真烂漫、善解人意的年龄，曹雪芹对其爱若珍宝。然而就在这一年北京天花病毒蔓延，夭折儿童无数。清代戏曲家、文学家蒋士铨对此曾有诗记载：“三四月交十月间，九门出儿几万干；郊关痘殇累计数，十家襁褓一保全。”曹雪芹的爱子罹疾，不治而亡。曹雪芹因之身心剧痛，伤感成疾，“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他的好友敦诚、敦宜、敦敏、敦颖等也相继罹厄。痛于曹雪芹父子之殇，敦诚在《挽曹雪芹》一诗中沉痛写到：“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并加了“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的注释。

人们常常称许《红楼梦》一书在情节设计上“草灰蛇线，伏笔千里之外”。然而书中关于天花的这一情节竟伸向了曹雪芹的悲剧命运中，可谓一语成谶。不朽名著竟与白雪歌残、红楼梦断。

双人记

■武夷山

造成较强的真实感。科学家也利用类似的装置来观察日食，这个东西叫“暗箱”(最早的照相机)。虽然迄今尚未发掘出弗美尔也用暗箱的直接证据，但施耐德推测，弗美尔从17世纪60年代初起就玩暗箱了，并十分着迷。她这个结论，是基于对弗美尔画作的精密光学分析，因为没有暗箱的帮助，断然画不出某些效果，例如对一些阴影的表现。施耐德说，弗美尔“利用暗箱……来开展光学实验，研究和发现暗箱的光学性质”。这些话用在列文虎克身上也完全适合。他们两人都是将光学仪器作为“人工眼”，来弥补自然眼的不足。

列文虎克利用自己的独门技术，制造了约500个单透镜显微镜，它们能将物体放大450倍。他进行的显微解剖的水平，即使今人也叹为观止。施耐德说，17世纪的生物学界不知道微生物为何物，因此，列文虎克必须训练自己做到“观察到什么，就承认是什么”，而不是“期望能观察到什么，果然看到了什么”。总之，这种积极主动的观察从根本上改变了17世纪的艺术与科学，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家，弗美尔也对视觉与光学极其感兴趣，他在油画创作时会借助于透镜。迄今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两人相识。但是，既然两人住得那么近，又有很多共同的朋友，那么为他们俩作联合传记就一点都不牵强了。作者施耐德以前写过两本书，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叫《改造哲学：维多利亚时期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辩论》，2011年出版的一本名著叫《哲学早餐俱乐部：改造了科学、改变了世界的四位杰出朋友》，两书均显现了她的深厚学养。

列文虎克和弗美尔都诞生于1632年，前者只比后者大一周。那时，代尔夫特已经以透镜玻璃的生产质量而闻名。透镜主要用于制作眼镜，但用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工具的情形也越来越多。望远镜大约于1600年前后发明出来。此后不到十年，伽利略将望远镜转化为一种科学仪器，他也曾将望远镜改造成最早的显微镜来观察研究昆虫。

17世纪的画家们已经时常用凸透镜和凹透镜帮助作画，利用凹透镜，可以更容易地观察清楚物体，利用凸透镜，将远景投射到画布上，可